

历代书法经典

何绍基

郝春燕 编著

余客金陵歸舟次讀小倉山房
稿書詠落花七律十五首取
以遣興

同治己丑春仲 道州何紹基

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历代书法经典

何绍基

郝春燕 编著



中州古籍出版社
· 郑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历代书法经典·何绍基 / 郝春燕编著. — 郑州 : 中州古籍出版社, 2017.10

ISBN 978-7-5348-6011-9

I. ①历… II. ①郝… III. ①汉字-法书-作品集-中国-清代 IV. ①J292.2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55287号

历代书法经典·何绍基

责任编辑 刘 晓

责任校对 钟 舟

装帧设计 王 歌

出 版 中州古籍出版社

地址: 河南省郑州市经五路66号

邮编: 450002

电话: 0371-65788698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

印 次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
印 张 9.5印张

字 数 147千字

印 数 1-3000册

定 价 28.00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序 言

何绍基(1799~1873),湖南道州(今道县)人,字子贞,号东洲居士、东洲山人,晚年号猿叟,又作蜃叟。《邱林跋语》谓因其“悬臂回腕”执笔法,其取李广猿臂弯弓之意,亦有九子山人、耜真等号。何绍基是活跃于清朝中晚期,成就颇高,书法个性突出的书法家,曾被誉为清四大家之一,与钱南园、刘石庵、翁松禅并肩。其学书上溯周、秦、两汉古篆籀,下至六朝南北碑版,重骨不重姿,自立门户,融贯碑帖,精通诸体,且善融会诸体,有“真行原自隶分波,根巨还求篆籀蝌”^[1]之识,并能兼取诸家所长,其子何庆涵在《先府君墓表》中曾总结道:“书法溯源篆分,下逮率更父子、鲁公、北海、东坡,神明众法,自成一统。”^[2]在清朝推崇碑学的书法风尚中,何绍基能够注重帖学的价值,推崇唐人书法,融贯碑帖,对中国近现代书法的创作具有启示价值。他强调书法的个性与创新,实事求是地分析所临习的碑帖,在研究的基础上思考书法的艺术性,于执笔、创作、书写工具等方面都有独到见解和创新之举。前人对其评价也很高,有人曾誉其为“有清二百余年第一人”。其羊毫书写的艺术性表现力直步邓石如之后,潘伯鹰先生甚至肯定地提出清代羊毫到何绍基手里“才集大成而收了前所未有的效果。凭这一点,他是一个开辟书苑新天地的英雄”^[3]。他在执笔上开创了“回腕之法”,力求将全身之力运达指间。

何绍基书艺成就得益于三个要素:一是家学严谨,其父何凌汉的家教为其打下了坚实的书法基础,同时使其获得了广博的识见。二是勤奋,何绍基书法艺术能独成一家,得到身前身后誉,与他刻苦的练习分不开,遍读名碑,勤练法帖,几十年未曾松懈。三是善学,他推崇老师阮元碑学思想,亦从长期观察临摹的实践经验中质疑南北之分,不肯高评《兰亭序》,但亦非人云亦云地简单批驳,而是切实地指出《兰亭序》真迹遗失,世传摹本失其神韵,故而不宜习之。他学碑取结构而不求笔法,是看到了刀工与书写笔法的差异。他求新、求险却并非舍弃传统,相反正是上溯至周、秦、两汉篆分,才使其行、草、楷皆有篆分意,从而自成一家。

[1] 清·何绍基《跋周允臣藏关中城武庙堂碑拓本》,何书置编注《何绍基书论选注》,湖南美术出版社,1988年版,第68页。

[2] 清·何庆涵《先府君墓表》,沈云龙主编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》第九十五辑,文海出版社,1966年版,第12页。

[3] 潘伯鹰《中国书法简论》,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,1981年版,第142页。

“古意挽可回，俗书期一荡。”^[1]“腕间创出篆分势，扫尽古来姿媚格。”^[2]

概括说来，何绍基能在晚清书坛上享有盛誉，与其重骨轻姿、稳中有变、平正中取险的独特书风是分不开的。他是清代晚期碑学书法的重要代表之一，兼重北碑与唐碑的学习，与碑学后期以康有为为代表的“卑唐”观区别开来，同时他还能着意笔法研究，敢于质疑书法以地域南北为分界的学说，兼取碑帖之妙，因而在碑学书法家中独树一帜，以行书中的篆分之意独步书坛。此外，其独有的“回腕执笔之法”也为其书法带来丰富的变化性，“直中见曲，灵活中含钝拙之意”^[3]，以回抱之势达到所谓的“圆空”，通身用力，但气力并不通畅，关节运转不方便，因此，其书写的过程可谓一场自我挑战，于不易中求稳、求直、求灵活，书写中常出奇意，兼备“巧拙、朴妍、正奇等相对立而又相和谐的丰富的线条内涵”^[4]。

何绍基行书个性特色最突出，但其是全能型书法家，五体兼善，都能体现其独特的书法风格。其楷书功力最深，40岁左右已经有所成，颜体字的体势与笔法决定了其基本格调，他发现了颜书中的篆籀之气，在楷书创作中取其拙朴之气，对《张黑女墓志》的吸收主要在字态的意趣上。

总体说来，其楷书“圆浑沉厚，庄严中见灵韵”^[5]，结体宽厚，有拙意；笔求涩，有颤动；提按技巧纯熟，有丰富的粗细对比；涨墨应用自然，凝重拙朴。小楷则有大字气势布局，与传统之取法灵巧地区别开来；大楷则于严谨的结构中注重用笔之凝涩，以圆为主，间有方、侧，以求巧变。

其行草书仍以圆笔为主，注重变化，墨色枯湿相映，轻重有序，方圆兼用，对比自然，字体结构空间疏密处理得当，用笔疾涩恰到好处，颤动中有流畅呼应之势。书体以颜体为构架基础，又融合《瘞鹤铭》之势，章法散落，笔势圆满，篆分之意盎然。

其隶书则取法汉碑，于《张迁碑》《衡方碑》《西狭颂》《石门颂》用功多，以方为主，用墨浓重，擅长涨墨出奇意，点画结构浑融一体，与瘦劲清晰处成鲜明对比，

[1] 何书置编注《何绍基书论选注》，湖南美术出版社，1988年版，第144页。

[2] 清·何绍基《石交图诗为邓守之作》，《何绍基诗文集二》，岳麓书社，2008年版，第584页。

[3] 徐明利《中国书法风格史》，河南美术出版社，2009年版，第314页。

[4] 徐明利《中国书法风格史》，河南美术出版社，2009年版，第314页。

[5] 徐明利《中国书法风格史》，河南美术出版社，2009年版，第315页。

运笔有拗势，左右波荡。篆书则求古意，颤抖扭曲，但有时略显人为之气息。

本书所选的作品以时间为纬、以字体分类为经排列，时间不详的则列于每种字体最后部分。如此分类，目的在于让读者能够清楚地看出何绍基作品创作发展的历程，一是展现其不同时期创作侧重的书体；二是凸显其不同时期同一种书体创作风格的变化，这样便于读者对照欣赏和临摹学习。我们后面将介绍何绍基书法风格的形成、发展及其主要特征。

目 录

序 言 /1

第一章 何绍基生平及书法修养 /1

第二章 何绍基书法交游简介 /15

第三章 何绍基书法艺术成就评价 /23

第四章 何绍基书法技法特征分析 /41

第五章 何绍基年谱 /59

附 录 /79

参考文献 /131

第一章

何绍基生平及书法修养

何绍基生于1799年，卒于1873年，享年75岁，是清代中晚期名臣，也是著名的书法家、文学家、理论家和金石学家。他曾担任翰林院编修、国史馆提调、提督四川学政等职，被诬罢官之后绝意仕途，主讲济南、长沙等地书院，晚年则主持苏州书局、扬州书局。就其一生而言，经历了由致力仕途向专心治艺的转变。60岁是其人生的分水岭，晚年在潜心书法和学问之后，书艺日臻成熟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书风。他学识渊博，是碑学代表阮元的门生，在古文、经史、诗学等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。就文学成就而言，他是晚清诗歌领域“宋诗派”的重要代表作家，主张“性情”说、“不俗”说等颇有建树的诗学观点；就书法成就而言，他是清代碑学创作实践和理论并进之集大成者。继阮元和包世臣鼓吹碑学理论之后，他是在实践上将碑学理论发扬光大的代表书法家之一。他广收碑拓，嗜好金石，精通书法，以篆隶入行书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碑帖相融的书法艺术。此外，他在碑帖研究中还将前人的理论深化，并基于书法实践的考察，对南北书派之分提出质疑，对帖学弊端进行了还归历史的辨析，还在技法方面独立门派，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书法理论思想。

一、何绍基书艺的文化背景

何绍基生于嘉庆四年，成长于道光、咸丰年间，卒于同治十二年，见证了清代中晚期四个朝代的变更。其所处的时代政治、文化背景有这样几个特点：

其一，清政府对汉文化采取了吸收的态度。清代在中国长达276年的统治期间，其巩固政权的主要措施包括汉化变革和安抚汉族知识分子，换言之就是学习和保留汉文化，吸纳原明代官员进入政府机构，并通过推行科举等方式给汉族知识分子开通仕途，从而争取汉族百姓对其政权的认同和合作。同时，清代皇室也特别重视汉文化学习，纵观历史，我们可以发现不仅皇帝本人，大部分的皇室弟子都擅长诗文，喜好书法。在此背景下，书法艺术作为汉文化的精华，在清代不仅没

有遭遇灭顶之灾，反而蓬勃发展。清代帝王喜欢收藏书画，在书法保存方面作了不少贡献，如康熙下令编纂了《佩文斋书画谱》，汇刻了《懋勤殿法帖》《渊鉴斋法帖》，乾隆则组织修撰了《石渠宝笈》《秘殿珠林》，摹刻了《三希堂法帖》《墨妙轩法帖》等集帖。同时，皇帝的个人喜好也推动了书法的发展，科举考试中书法标准化从某个方面来说是书法繁荣的内在驱动力。尽管在清王朝 200 多年间，皇帝的标准化帖学审美趣味形成了略有差异的“馆阁体”，阻碍了书法的艺术个性化发展，但同时也推动了士人学者求新变革的创作心态的发展。

其二，明代书风影响。明代书法帖学和书法审美风格都出现了新的变化，对清代书家有一定影响。一是帖学学晋唐但缺乏真迹。明代帖学书家大都以赵孟頫为主要学习对象，因此赵书成为当时的流行风尚。此外，习王字者发展出漂亮而程式化的“中书体”。二是行草的抒情化成为时风。文徵明、唐寅、祝允明是为代表。三是宋代书法的写意被创新性发展，从而带来明代书法审美追求的新格局。相对当时的流行书风赵书体，董其昌于帖学中写出一番新气象，舍其秀媚；张弼、陈献章、沈周、徐渭等人求新图变，书法风格中出现了天真、支离、枯劲、姿纵等审美取向。尤其是在明灭亡后，这些明代遗民在书法艺术中寻求政治上的反抗，以新的审美趣味向流行时风挑战，如石涛的“我自为我，自有我在”、傅山的“四宁四毋”等。这种求新的审美意识又在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发展，艺术家主体意识加强的情况下被强化、发展，为清代书法风格的革新做了铺垫，形成了清代书法求新去俗的书法理论思想，如梁巘的“学书无惑俗议”论、郑板桥的“领异标新”为美观等。四是书体杂糅的创作意识较为鲜明，行草入篆体，篆隶草化在当时已经是有意为之，明朝宋璠、赵宦光曾因此名噪一时，张弼则将今草和章草糅合为狂草。明人书体杂糅并非随意为之，与其书法变革求新的审美意识紧密相关，也与书法审美规律的理性思考、书法理论的深化发展有直接关系。明代遗民对书法美的理解直接影响到清代书法创作，如傅山就提出“楷书不知篆隶之变，任写到妙境，终是俗格”（《霜红龕集》卷三十七《杂记》），“不知篆、籀从来，而讲字学书法，皆寐也，适发明者一笑”（《霜红龕集》卷三十八《杂记》）。

其三，碑学兴起，从朴学和金石学中独立出来，为清代书法带来创新的生机。清初顾炎武、阎若璩、朱彝尊等学者带动了金石学的复兴，也推动书法界寻访碑

石的风气，傅山、郑簠等书家在访寻、研究和临习汉碑方面下了很大功夫，并在实践中应用，学者与书家的相互交流影响是碑学兴起的开端。

随着满汉矛盾的升温，尽管清王朝对汉文化采取吸收兼用的态度，汉族知识分子成为政治迫害的对象，尤其是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，大兴文字狱，加之小人作乱，挟私诬告，造成时局险峻、人人自危的文化环境，“经世致用”之学容易招引灾祸，知识分子为求自保大都转向考据学，因而文字学、金石学也发展起来，人们的研究热情刺激了碑文的发现，同时也引发了碑派书法的产生，新的技法和审美追求在多元文化因素酝酿的形势下诞生了。乾、嘉之际，著名的学者有钱大昕、王昶、毕沅、翁方纲等人，他们的努力推动了碑派书法的繁盛，进而对扭转帖学书派的审美取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与明人以碑版为辅、法帖为主的碑帖观不同的是，碑学书法非常重视碑刻的学习，当时的文化氛围也为碑学书法的繁荣奠定了文化基础，大量的钟鼎彝器、碑刻拓本和摩崖石刻可供学习、研究。

基于清代书坛欲变法而不知如何变的文化境遇，随着唐前的碑文出土，阮元提出“北碑南帖”论，以之划分“南北书派”，学术观点虽然有偏颇之处，后人亦多有反驳，但其出发点在于“寻魏齐之坠业”，希望以汉魏古法挽救俗书之习。他还分析了局限于帖学的弊端，指出魏晋南北朝书家学书的丰富性。唐代名家也是不拘帖学，“唐人殷氏（仲容）、颜氏（真卿），并以碑版隶楷世传家学，王行满、韩择木、徐浩、柳公权等亦各名家，皆由沿习此法，始能自立”。而元代书家为《阁帖》约束，“且若《楔礼》之外，更无书法，岂不陋哉”^[1]？阮元之说酝酿了清代书法以碑入书的变革思路。包世臣则从形式、技法的角度提出古人碑刻书法的启示价值，就用笔来说，他提出了“中截”之论和“骨力气势”之说，“用笔之法，见于画之两端。而古人雄厚恣肆，令人断不可企及者，则在画之中截。盖两端出入操纵之故，尚有迹象可寻，其中截之所以丰而不怯、实而不空者，非骨势洞达不能俾致”^[2]。此后，“骨力”成为清代书家和理论家的一种追求，如朱和羹提出学帖，学唐不可走向妍媚，应当注重骨力。“余书素恶佻达，故于颜、柳、欧、褚及北海书日夕参摹，

[1] 清·阮元著，邓经元点校《擘经室集》（下），中华书局，1993年版，第596页。

[2] 清·包世臣《艺舟双楫》，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室选编《历代书法论文选》，上海书画出版社，1979年版，第653页。

未敢以妍媚取悦也。客曰：‘君于八法、用笔、结体已自明悉，每嫌骨力多而妍媚少，故时人都不悦君书。’余曰：‘惟其骨力多，方合古人；惟其不悦时目，正是进步。’”^[1]

概括说来，追溯晋唐造成了清代唐碑的盛行，因而何绍基的书法基础是取法于唐代颜、欧诸体，碑学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则使何绍基注重古代碑文访寻，并兼取所长，选择了书法去媚的审美趣味。同时，在表现形态上，何绍基采用了书体杂糅的方式表现其审美意识。

二、何绍基家世和生平简介

当然，一位书法家的成长与其家庭教育也有密切联系。何绍基的家庭是典型的文人士大夫家庭，父亲言行严谨，为官清廉，忠君效国，教育子女有方。母亲恪守妇道，一生节俭持家。父母的教育可谓言传身教，对其品质、书学观、书法艺术创作等都有深远的影响。

母亲廖夫人（1768～1849）世居西北乡小坪村，一生勤俭贤惠，在丈夫求学应考入京之时，独自带着几个孩子在娘家跟随兄弟谋生，不畏贫寒，支撑家庭，教育孩子，恪守妇道。“乾隆乙卯于归，相先公作苦读书……初生男震儒不育，嗣孪生绍基、绍业，逾三晨即负儿行汲，冒严寒，耐劳瘁，农家妇皆自谓不及。嘉庆辛酉，先公以拔贡入都，时绍祺甫生，母携儿就育于舅氏，外祖父已先逝，舅先瑞，一寒诸生，且耕且读，吾母姊弟共艰劬，孝养外祖母，拊畜三子。尝襁儿入山拾薪，竹枝伤左目，后迄不愈……乙丑先公登第，假还，吾母始受命服归东门，以丙寅冬偕至京师。”^[2]待到丈夫仕途顺利，职高位重，她也治家如故，没有半分坐享荣华

[1] 清·朱和羹《临池心解》，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室选编《历代书法论文选》，上海书画出版社，1979年版，第738页。

[2] 清·何绍基《先妣廖夫人墓志》，龙震球、何书置校点《何绍基诗文集二》，岳麓书社，2008年版，第935页。

富贵之心，“仍长年布衣，不御绮縠。所嗜饮食，惟田家风味，亲串问安，为语早年勤苦琐屑，以示身教”。其“淡泊坚定，荣悴一致”^[1]，给子孙树立良好道德典范，家风严谨。母亲的德行给何绍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对其性格塑造和品质培养有潜移默化的影响。父亲的忠君爱国之心和书法艺术见解则给了他更直接的影响。

何绍基的父亲何凌汉（1772～1840），是嘉庆、道光年间在政治上颇有作为的官员。先后任广东、福建、浙江、山东、顺天等地乡试主考官和山东、浙江学政。官至户部尚书。其为官正直、清廉，在当时颇有声名，曾在主持浙江乡试时查明官绅幕僚联合舞弊案，并因之受到道光帝的赞赏。而且其德才兼备，尤其是书法艺术上的造诣在海内外都有影响力，连朝鲜、琉球等国贡使都常常向其索求作品。何凌汉的家庭教育也非常成功，四个儿子在书法、绘画方面成就都颇高，被誉为“何氏四杰”，因此何氏家族在晚清可谓书法世家，名盛一时。

因为家学严谨，所以何绍基习书较早，幼年由舅舅启蒙读书、识字，八岁后随父亲进京，父亲亲自指导其书法、诗文等，并为其专门聘请老师坐馆教育。父亲的书写习惯、书法观念对何绍基的影响是深远的，何绍基曾言“急遽时作字，必裁划正坐而后书……家范严谨称于时”^[2]。父亲何凌汉于嘉庆十年（1805）中进士，名列探花，和当时大多数通过科举获取功名的学子一样，他精通唐代楷书，倾心欧、褚、颜，对何绍基的教育也是从颜书入手，并以“横平竖直”为评价书法的标准。同时，他作为嘉庆、道光年间的名臣和书法名家，交游的学者和书法家层次也都很高，为何绍基的成长营造了好的氛围。何绍基在他的影响和帮助下结交了很多当时的书法名家，进步很快。不过何绍基和大多数文人一样，前半生以求学考功名为人生追求，直到救国救民的理想被官场的黑暗摧毁之后才转而投向艺术和学问，以此寻求人生的寄托。因而，其一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：

（一）求学应考

何绍基年幼随母亲寄居舅舅家，由舅舅启蒙教育。八岁随父亲入京，开始接

[1] 清·何绍基《先妣廖夫人墓志》，龙震球、何书置校点《何绍基诗文集二》，岳麓书社，2008年版，第936页。

[2] 清·何绍基《先考文安公家奠文》，龙震球、何书置校点《何绍基诗文集二》，岳麓书社，2008年版，第871页。

受正规而严格的教育。嘉庆十四年（1809）至嘉庆二十三年（1818），父亲为其先后聘请了名师孙镜塘和张掖垣，在老师的严格教育下，何绍基开始了“十年寒窗”的求学应考生涯。此间因父亲的影响，很多贤能之士聚集其门下，何绍基才得以与才学出众之士频繁交流，受益匪浅。其间，他在父亲的影响下还收集了很多碑刻拓片。尤其是在道光二年（1822），其父任山东学政，他侍奉身边，在济南结识了一批金石碑刻爱好者，谈碑论画，增长了不少学识。道光十一年（1831），随父亲赴任浙江学政一职，而后收获颇丰：观宁波范氏天一阁珍藏碑帖拓片，于焦山冒雪手拓《瘞鹤铭》，并在杭州结识了金石僧达受（1791～1858），路过苏州与林则徐（1785～1850）畅谈书法。

道光元年（1821）至道光十六年（1836），何绍基经常往返于京湘，参加数次科举考试。道光十一年（1831），他考取了优贡生，为正、副考官程春海、邵丹畦两位先生赏识，皆以为国士。道光十五年（1835），何绍基由京返湘，参加乡试，为乙未恩科主试吴晴舫、王春绶两位先生赏识，夺取第一名，中湖南解元。其间，受邀在湖南巡抚吴荣光（1773～1843）署中留居七日。吴荣光是著名的收藏家，家中书画碑帖所藏甚丰，何绍基逗留期间尽观吴氏所藏，并为之题跋数十件。

道光十六年（1836），何绍基参加丙申恩科会试成为贡士，同年四月参加殿试。殿试中何绍基表现出色，为长文襄、阮文达两位读卷官赞赏，本应为第一名，但因官场矛盾，有官员意欲寻找他文章中语言表述漏洞，从而诬陷其欺上，为保护之，改为二甲第八名，为翰林院庶吉士，很多史料对其“语疵”事件也讳莫如深。由此，何绍基进入翰林院庶常馆学习。庶常馆是清代新进士深造学习的场馆，当时阮元为教习之一。

（二）任编修典乡试

何绍基在庶常馆学习期间成绩优秀，名列一等，很快得任翰林院编修、文渊阁校理，国史馆协修、纂修、总纂、提调，武英殿协修、纂修、总纂、本衙门撰文，教习庶吉士等文职，在史馆任职期间，他曾奉命典乡试三次：一是道光十九年（1839），其以正考官“典闽试”，也就是福建乡试，同年其父任顺天乡试副考官；二是道光二十四年（1844），充甲辰贵州乡试副考官；三是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），以副考官使粤东，也就是典试广州。在这一时期，何绍基政绩不凡，颇有声名。

在福建乡试中为士称盛，并于道光十六年（1836）被提任为国史馆提调，其间，他发现馆中照例进书都只有一品、二品大臣的传记，因而“因创拟条例，欲遍搜官书及前人文集补办国初以来三品以下各臣传”^[1]。此阶段虽然事业顺达却遭遇失亲之痛，从广州典试归来母亲去世，咸丰元年（1851）正月，其葬母于长沙回龙坡。

（三）简放学政

咸丰二年（1852）至五年（1855）是何绍基简放学政的时期。咸丰二年（1852），他已经 54 岁，为母亲服丧完毕，因之前由侍郎张芾的举荐，接受了咸丰帝的两次召见，八月被委任为四川学政一职。在四川为官期间，居官廉正，勤于政事，多次上奏折力主改革，整肃考场，一扫旧时弊窦；在当地治理有方，批示百姓词讼，“平反命案枉死者十七人”，深得百姓爱戴；他还奉咸丰帝朱批访察地方情况，“奏参总督布政司、按察司、知府等员，置承审官员七人于法，闾阎快之，咸以为天眼开”。但他大刀阔斧的改革触犯了当地权贵的利益，同时，清政府对汉族官员也不完全相信，因而很快遭到打击报复，首先署督乐斌、总督裕瑞等人借河东土司争袭之案联合弹劾何绍基；继而，因其“缕陈时务十二事”被上责之“信口雌黄，肆意妄言”，最后由部议以“私罪”免去了其官职，其时在职不满三年。

（四）绝意仕进

何绍基经历了意气风发、立志报国的仕途得意，也遭遇了恶意诽谤、肆意攻击的官场沉浮，几十年的官场生活让他看透了权力纷争的真相，被罢官后，他绝意仕途，开始游历山水，专心治学、习书。他一路游览了峨眉、瓦屋，离开四川后经宝鸡到西安，又饱览了西岳华山和帝陵，后继续东下至山东济南。咸丰六年（1856），山东巡抚崇恩邀请其至泺源书院（济南）任主讲；咸丰十一年（1861），湖南巡抚胡恩堂邀请其到城南书院（长沙）任主讲，其讲学生涯长达十一年。晚年居住于苏州，同治九年（1870）受两江总督曾国藩和江苏巡抚丁日昌邀请，主持扬州书局校刊工作，其中他主持的《十三经注疏》最有名，与此同时他还被浙江巡抚杨昌浚聘为浙江孝廉堂主讲。同治十二年（1873）何绍基突然生病并很快

[1] 清·何绍基《十月十二日约黄海华等小集吾斋为消寒第一集》，《何绍基诗文集二》，岳麓书社，2008年版，第572页。

病逝于苏州，据《墓表》记载：“癸酉七月初旬，忽患痢下，昼夜数十起，元气骤亏，至二十日丑时，告终于苏州省寓。”^[1]终年 75 岁。

何绍基和大部分文人一样，早年致力仕途，于书法不过是科举之用和兴趣爱好，到了晚年专心于文化教育和艺术创作。早年的基本功和常年的刻苦练习在凝练的过程中放出奇光异彩，终究成就了其独特的艺术风格，在清代书坛留下碑学代表之作。

三、学识修养与书艺成就

何绍基是清代典型的文人士大夫代表。何绍基的家族成员莫不以儒家道德规范为准，上至父母、下至兄弟及家眷，都能以身作则、亲力亲为。受家庭影响，他生活简朴、淡薄名利，以忠孝为人生准则，因而正直、清廉，不畏权贵，注重士人之气节。其为国史馆提调时曾“因馆中照例进书，皆一品二品大臣传，无三品以下传，虽经高宗屡次严旨申谕，史馆乃因循至今，因创拟条例，欲遍搜官书及前人文集补办国初以来三品以下名臣各传，商之总裁穆师相（穆彰阿），坚不见允，余即日辞提调矣”^[2]。更不用说其后为学政期间因刚正不阿得罪权贵，获罪罢官。正因为他以正义为本职，以气节为修身之道，所以，为官能有所作为，也能淡泊名利，绝意官场。

何绍基是才学世家，家族成员大都秉承家学，博学多才，艺道兼备。其父诗文响绝海内外；兄弟四人皆精通诗文、书法、绘画，涉及金石学和考据学（朴学）。何绍基的孪生兄弟何绍业（1799～1839），字子毅，号砚芸、芸轩、琴庄。其淡泊名利，“神慧绝人”，书法和绘画之名载入史册，“于天文、仪象、律吕、六书之

[1] 清·何庆涵《先府君墓表》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0年版，第721页。

[2] 清·何绍基《十月十二日约黄海华等小集吾斋为消寒第一集》，《何绍基诗文集二》，岳麓书社，2008年版，第572页。